

秦少游年譜長編

九三老人顧廷龍題

徐培均 著



秦觀是宋代著名文學家，他在詩文詞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在詞學史上，被譽為「婉約派」之宗。徐培均先生在二十多年潛心研究秦觀著作的基礎上，參考前人所編年譜，撰寫了這部《秦少游年譜長編》，將秦觀的一生平事迹都編入了年譜。對譜主的家世、生平、交游、仕履作了詳細的考證。對其文學創作活動按年代作了詳盡考辨，對其政治遭際也結合時代予以評述。從而使本譜的內容更加豐贍詳盡，成爲目前研究秦觀生平及創作的最有價值的傳記資料。



徐培均著

秦少游年譜長編

(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秦少游年譜長編/徐培均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2.12

ISBN 7-101-02637-0

I. 秦… II. 徐… III. 秦觀(1049~1100) — 年譜
IV. 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49210 號

責任編輯:王秀梅 聶麗娟

秦少游年譜長編

(全二冊)

徐培均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1¹/₄印張·351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37.00 元

ISBN 7-101-02637-0/K·1040



秦觀像 南薰殿歷代聖賢名人像



元趙孟頫《西園雅集圖》

觀頓首昭日模款
昭甚慰馳仰之懷比奇
教欣承
履候佳勝文字已領精
尚參候不宣
觀再行
方升賢交閣下

江蘇高郵文游臺碑廊石刻拓片



淮海閒居文集序

明初高郵軍學刻本

淺草文庫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藁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成二百一十有七篇次爲十卷號曰淮海閒居集云

舒王荅蘇內翰薦秦公書

安石啓得書知尚盤桓江北俯仰逾月不勝感帳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竒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京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餘卷正眊眩未

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秦觀是一位重要作家。他多才多藝，好學深思，在詩文詞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現存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是他思想與智慧的結晶。近二十年來，我對秦觀著作作了一番箋釋與梳理，愈益感到這是一宗寶貴的文化遺產，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和開發。秦少游年譜長編便是在這樣的基礎與想法上寫成的。秦觀一生的事蹟已被編入年譜，此處不再贅述。現在擬就譜中概括四點，談一些個人的看法，以備一說。

一、秦觀作品的分期與主要內容

秦觀生於宋仁宗皇祐元年（一〇四九），卒於宋徽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一生活了五十二歲。他的青少年時期，主要是在故鄉高郵農村度過的：主要是讀書，大忙季節也參加一些農業勞動，這是舊時農村半耕半讀家庭中的子弟常有的現象。至其從事創作，大約要從二十歲左右，也就是神宗熙寧元年（一〇六八）前後開始。那末至其壽終，他的創作至少經歷了三十二年。南宋初年，呂本中已開始對秦觀作品作了大致的分期。他在呂氏童蒙詩訓中說：「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也就是說，他以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少游自郴州編管橫州為分界線，說明此後作品的風格發生重

大變化。他的意見基本上是對的，但還不够準確和具體。我認爲根據秦觀的生活歷程，他的創作可以分爲前、中、後三個時期：

秦觀創作的前期從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作浮山堰賦始，至元豐八年（一〇八五）止。其中除了兩度漫遊、三次應舉之外，基本上是在高郵家中學習時文以備應舉。兩度漫遊：一度是熙寧九年與孫莘老、參寥子同遊歷陽（今安徽和縣）之湯泉，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見遊湯泉記）；一度是元豐二年春搭乘蘇軾調任湖州的便船南下，省大父承議公及叔父秦定於會稽，郡守程公闢館之於蓬萊閣，從遊八月，酬唱百篇（見謝程公闢啓）。此外，他還常到離家不遠的揚州和楚州，有詩投贈揚州守鮮于侁和呂公著，並與楚州教授徐積相酬唱。三次應舉分別爲元豐元年、五年和八年。前兩次均未考中，但有詩詞反映了落第心情，記錄了往返京師的足跡。著名的滿庭芳（山抹微雲）詞，就是將仕途失意的「身世之感打併入艷情」①。其間有對淮南詔獄二首，究竟爲何陷入詔獄，現在還沒有足够的史料可資考證。總之，這一時期的紀遊之作佔壓倒多數，可稱少游創作上的發軔時期。

秦觀創作的中期是從元豐八年考中進士開始至紹聖元年（一〇九四）止。元豐八年三月神宗逝世，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斥逐新黨，起用舊臣司馬光、呂公著爲相，接着實行「元祐更化」，逐漸廢除熙豐新法。少游的創作與整個元祐時期相適應。元祐元年他爲蔡州教授，三年，以蘇軾、鮮于侁薦，進策論五十篇，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試，時洛蜀黨爭起，少游被洛黨「誣以過惡」，遂引疾歸汝南。五年五月，復由范純仁、蔡肇薦，自蔡州入京，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歷祕書省正字、官至國史

院編修。在京四年，詩人政治上曾兩次遭受打擊，一次是上面所說的舉賢良不中，一次是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七月遷正字，又因洛黨彈劾而罷。這兩次打擊並未直接發之於吟咏，僅在某些篇章中作了曲折的反映。這一時期篇章相當豐富，內容也較複雜，同前期相比，除模山範水之外，增加了對時局的關心，如和邢敦夫秋懷十首之五，表示同意司馬光割棄熙河與夏人的主張；而在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其二，又說：「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對契丹與高麗，也曾發表己見。政見雖因時而異，但其愛國思想却是貫徹始終的。這一時期寫了為數甚多的政論文，也為歌樓舞榭填了不少詞，內容多為艷情，然不失品格，「方之美成，有淑女倡妓之別」。（人間詞話）可說這是他創作上的豐收時期和發展時期。

從紹聖元年（一〇九四）三月被放出京，至元符三年（一一〇〇）赦歸，是秦觀創作的後期。這與呂本中的分期大致相符，但具體時間提前了三年。因為這是以作者政治上遭受貶謫為斷限，而不僅是從地域上來劃分的。這一時期長達七年，照理作品應該較多，但除詞之外，鈎沉輯佚，僅得詩五十七首。如從元符元年過嶺後計算，則僅存詩三十三首，散文則僅存數篇。主要是因為作者身處放逐之中，一方面有使者承風望旨，沒有創作自由；一方面是貶所不斷變更，即使有所創作，也容易散失。儘管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但無論在抒情的深度上和藝術技巧上，都遠遠超過以前兩個時期。這首先表現在詞作中，貶謫之初，他就以望海潮（梅英疏淡）、風流子、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柔）抒寫了不幸的預感；既謫之後，又以千秋歲、踏莎行、如夢令（遙夜沉沉如水）、阮郎歸其三、其四以及好事近等，傾訴遷謫之恨。他的千秋歲曾引起蘇軾、黃庭堅、孔平仲、李之儀、王之道、丘密、釋惠洪等的共鳴，紛紛次韻，形成一股

範圍很大的波瀾，在詞史上形成一個貶謫詞創作的高潮。此時少游所作的雷陽書事三首、海康書事十首，以質樸的語言反映了自己謫居嶺南的生活和思想，還勾勒了這一地區的風俗畫，詩風爲之一變。因此不妨說，這一時期標誌着他創作上的成熟。

以上三個時期的劃分，只能是一個大概。若細加研討，每一時期還可分爲若干階段，如中期便可分爲蔡州階段和汴京階段，這裏就不一一觀縷了。

二、秦觀與蘇門的關係及其在當時文壇的地位

有宋一代的文學，以其獨特成就與獨特風格彪炳千秋。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兩宋之世。」（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序）不僅宋詞可與唐詩、元曲，前後輝映，各領風騷，即使宋代詩文，也各擅勝場。明人茅坤選唐宋八大家古文，除韓愈、柳宗元爲唐人外，其餘爲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與「三蘇」，六人皆出於北宋。至於宋詩，更以其風格夔絕，得與唐詩分庭抗禮，自成一統。雖然北宋之初，詩壇猶有中、晚唐餘波，西崑體彌漫一時。可是到了仁宗時期，詩風便發生變化。歐陽修領導詩文革新運動，自比「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團結了梅堯臣、蘇舜欽等詩客文人，「爲自然之聲，窮極幽隱」^②，並用韓孟詩派的奇峭、勁健、瘦硬、怪巧，來革除西崑以來綺靡衰頹的流弊，給宋詩注入了剛健的氣格。但也出現了「以議論爲詩」的傾向。歐陽修之後，王安石繼起，他想糾正當時「以議論爲詩」的傾向，憑藉學識，鍛煉技法，形成爽朗明快的詩風，後期則轉爲深婉蘊藉，饒有韻味。但他畢竟

是一位政治家，詩詞創作難免視爲餘事，所以他在當時文壇上影響不大。因此到了神宗熙寧、元豐以後，歷史便將蘇軾推上主盟文壇的地位。

蘇軾是一位傑出的大家。他以聰穎絕倫的才華，在詩文詞賦乃至書畫等各個領域，創造了卓越的業績。其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一洗綺羅香澤之態，豪放與韶秀並存，淡雅與俊逸兼具，成爲「此老平生第一絕詣」^③。其詩馳騁筆力，揮灑自如，隨物賦形，姿態橫生。或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或如行雲流水，文理自然。至此宋詩便開創了「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④的新局面，與唐詩劃然有別，漸漸地蔚爲大國。

東坡門下有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人稱「蘇門四學士」，加上陳師道、李廌，又稱「蘇門六君子」。東坡雖然各方面成就極高，但他能够讓每位弟子自由發展，不像王安石那樣「好使人同己」^⑤。他的門生都能根據自己的個性和特長，展示各自的風采。黃庭堅以「脱胎換骨」、「點鐵成金」的手法，寫成生新奇崛、拗峭冷澀的詩篇，創造了江西詩派，得與東坡並駕齊馳。陳師道詩先學東坡，後學山谷，「寧拙毋巧，寧樸毋華」^⑥，終於成爲江西詩派「三宗」之一，然亦「平淡雅奧，自成一家」^⑦。只有晁補之受東坡沾溉，崇尚天機自然，「諸體詩俱風骨高騫，一往俊邁，並駕於張（耒）、秦（觀）之間」^⑧，然視東坡尚去一程。張耒詩也未步趨東坡，而多學白居易，風格冲夷平易，故元人方回送羅壽可序云：「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家。」今人錢鍾書談藝錄也說：「宋之柯山，……則宋人之有唐音者。」可見他不像東坡那樣的「宋調」。蘇軾於李廌之文，多有稱譽，如稱「子駿行狀，豐容雋壯，甚可貴也」^⑨；其詩雖「極爲奇

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⑩。可是他對秦觀却另眼相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云：「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東坡自己也曾稱許秦觀說：「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⑪也就是說，秦觀有一枝生花妙筆，能將別人難以形容的事物，曲盡其妙地描繪出來。

爲什麼東坡特別愛重少游？簡言之，即因他富有才華而文學成就又很高。首先說詞。在當時詞壇上，東坡以豪放傑出之詞，一新天下耳目；而少游詞則清麗淒斷，深沉婉曲，意味雋永。故一爲豪放之首，一爲婉約之宗。明人張綬在詩餘圖譜凡例中說：「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學士中，唯少游詞風與東坡有異，故况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云：「有宋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爲一代山斗。黃山谷、秦少游、晁無咎，皆長公之客也。山谷、無咎皆工倚聲，體格於長公爲近。唯少游自關蹊徑，卓然名家，蓋其天分高，故能抽秘聘妍於尋常播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者獨深。」張文潛贈李德載詩有云：「秦文倩麗舒桃李。」彼所謂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詞論，直是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倩麗之桃李，容猶當之有愧色焉。」王晦叔碧雞漫志云：「黃、晁二家詞，皆學坡公，得其七八。而於少游，獨稱其『俊逸精妙』，與張子野並論，不言其學坡公，可謂知少游者矣！」不學東坡，自關蹊徑，獨樹一幟，所以少游之詞，卓然名家，與東坡之詞，構成婉約派與豪放派兩座高峰，巍然

屹立在中國詞史之上。

少游之詩文，也有獨特風格，可惜後來爲詞名所掩。所以明人胡應麟說：「秦少游當時自以詩文重，今被樂府家推作渠帥，世遂寡稱。」^②現在應該還他以本來面目。人們談到秦觀詩，多稱其七言絕句，如春日五首、秋日三首。雪浪齋日記就曾說「海棠花發麝香眠」，「詩甚麗」；元好問論詩絕句評春日詩其二則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此意當沿襲南宋放陶孫臞翁詩評「秦少游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之觀點，不過經他形象化的描述，「女郎詩」一語，遂成千古定讞。其實文藝作品應該呈現多種風格，既有陽剛之美，也應有陰柔之美；既有東坡的「丈夫詩」，也應有少游的「女郎詩」，這樣才會造成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其實少游詩何止七絕一種體裁，又何止「女郎詩」一種風格？他的五古和七古早就受人激賞。王安石答東坡書稱其詩云：「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元豐三年呂公著知揚州，他以春日雜興之一投卷，呂本中舉其中「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二句，引李公擇之語評曰：「雖謝家兄弟得意（之作）不能過也」^③。說明他的詩已超過南朝謝靈運和謝惠連。蘇軾讀了他的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詩，更和詩讚之曰：「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④壓倒林逋的名作山園小梅，容或過譽，然此詩咏梅，務在神似，不能不是一大特點。至於少游過嶺後所寫的詩，呂本中已稱其「嚴重高古，自成一家」，這裏就不再複述了。

前人對少游之文，評價也很高。東坡就曾說：「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綉發，議論鋒起。」^⑤黃庭堅也說：「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筆墨深關鍵，開闔見日星。」少游的策論，不但論事說理，切中時

弊，而且行文流暢，清新可誦。同當時一些刻板式的策論相比，自然高出一籌。

但是嚴格說來，少游的策論受東坡影響較大，尚欠個人風格。其原因之一便是在東坡指導或影響下寫成的。元豐三年，蘇轍貶往筠州，少游託他將所寫的策論奇兵及盜賊帶給貶居黃州的蘇軾，軾答書云：「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以後少游即依此原則撰寫其他策論。原因之二是有些地方沿襲了東坡的觀點。如策論序篇云：「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表面是用禮記月令，實則受到東坡答李端叔書「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的啓迪，而此書是在元豐三年託他轉交的，不可能沒有看到。又如韓愈論稱韓文杜詩為「集大成」，人們多以爲是少游創見，其實也是東坡的觀點，見陳師道後山詩話及東坡書吳道子畫後。其盜賊下一文云「有搢紳先生告臣曰」一段，明人張綆即指出「實指蘇公，殆非設言也」^①。由此可見，少游策論，「與東坡同一軌轍」，「此少游之所以不及東坡也」^②。真正代表少游散文風格的，應該是他的哲學論文，故近人林紓說：「集中如魏景傳及心說，皆直造蒙莊之室，爲東坡集中所無。」^③

少游作品的成就，標誌着他在當時文壇的地位。在蘇軾主盟文壇時，他和蘇門其他學士一起，用自己的作品組成了時代的交響曲，在中國文學史上寫出了光輝的一頁。

三、秦觀在黨爭中的態度

北宋時代，黨爭如大海的波濤，時起時伏。著名的有仁宗時的慶曆黨爭，神宗時的熙豐黨爭，哲宗

時的元祐黨爭以及徽宗時的再度反覆。除了慶曆黨爭而外，秦觀的一生差不多都經歷過了。

神宗熙寧間王安石의 變法，動機不可謂不好。趙宋建國以來，西有夏人，北有遼國，邊境時有磨擦。爲了求得國家的安寧，真宗時就與遼方簽訂「澶淵之盟」，每年向遼繳納歲幣，計銀二十萬兩，絹十萬匹。至仁宗時，「歲輸五十萬於契丹（即遼），而俯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西夏）元昊父子，而輪繒帛以乞苟安」^①。逮至神宗當政，國家已積貧積弱。王安石的變法正出於改變這種局面的考慮。然而舊黨人物如文彥博、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孫覺、李常以及蘇軾等對此持有不同政見，紛紛給以反對。而且新法在執行中，又暴露出不少弊端，並出現了一些以權謀私的官吏，於是沒有多久就趨於失敗。在王安石變法時，秦觀年方二十二歲，尚居家讀書，未及參與政治。他僅是在元豐初所寫的田居四首詩中涉及到青苗法、市易法等推行後的影響，如云：「倒筒備青錢，鹽茗恐垂橐。明日輪絹租，鄰兒入城郭。」^②「辛勤稼穡事，惻愴田疇語。得穀不敢儲，催科吏旁午。」語氣溫和，不痛不癢。同蘇軾「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③；「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④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到了元豐七年，王安石新政失敗，退居金陵蔣山，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遂捐棄前嫌，前往探望。離開後，東坡又寫信向王安石推薦秦觀，安石熱情地回了信，說：「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⑤可見他們當時已消除了黨爭成見，言歸于好。但秦觀對王安石新法並不完全排斥，元祐三年應制科所上的策論，既不反對新黨的免役法，也不反對舊黨的差役法，而是建議「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⑥。唯有科舉法的改革（神宗熙寧四年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停制科，專以經義、論

策取士，觸及了秦觀的個人利益，常常引起他的不滿。如次韻邢敦夫秋懷十首之九云：「祖宗舉賢良，充賦多名儒。執事惡言者，此科爲之無。」他在元豐中爲了應舉，不得不學習王安石所制定的三經新義，每每牢騷滿腹。這時的思想，頗與蘇軾答張文潛縣丞書所說的「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相似。

在秦觀的文章中，有一篇李公擇行狀罵王安石極爲厲害，如云：「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頒焉，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也就是說彼時三人小集團把持朝政，而呂惠卿與王雱反而凌駕作爲宰相的王安石之上。此事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已詳加辨析，謂「史載王元澤（雱之字）事，其最醜惡者多出於邵氏聞見錄。穆堂先生嘗憤之，爲考其歲月，毫無一實。」不過邵氏聞見錄的作者邵伯溫小秦觀十三歲，所記疑更晚於李公擇行狀，而非他的首創。然依文意推之，這些其實也非秦觀的觀點，而只是轉述李公擇的意見罷了。

元祐二年，舊黨分裂。是時呂公著爲相，群臣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程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更多。新黨人物大都在野，他們冷眼旁觀，伺機報復。秦觀當然站在他的老師蘇軾一邊，因此便